

未央：将笔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贺秋菊

未央是抗美援朝文学的代表作家，是重要的爱国主义诗人，他深情眷恋着祖国和人民，在诗歌中，他抒写对祖国和人民的爱、记录心底的善，释放出火热的激情，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1950年冬天，年仅19岁的章开明和小两岁的弟弟章开海跟随首批赴朝的志愿军战士跨过鸭绿江，踏上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两年后从战场上回来，志愿军战士章开明写下了抒情诗《祖国，我回来了》，1953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未央”。20世纪50年代，未央创作了《祖国，我回来了》《枪给我吧》《我们的武器》《驰过燃烧的村庄》《杨秀珍》等，这些诗歌带着诗人的亲历、体验和思考特征，构思简洁，语言朴素，具有鲜明的生活气息和激昂明快的情感，尤其是独白式的抒情风格和对典型瞬间的有效捕捉、刻画，直击人们的心灵。

《祖国，我回来了》是未央的代表作，诗人通过简短有力的诗句表达激动人心的场面和饱满的感情。“车过鸭绿江，好像飞一样。/祖国，我回来了，/祖国，我的亲娘！/我看见你正在/向你远离膝下的儿子招手。”这样的“典型瞬间”，通过“飞一样”驶过鸭绿江和祖国母亲的“招手”呈现出来，诗人保家卫国的万丈豪情涌上心头，诉诸笔端。然而，归国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视祖国如同“亲娘”，对朝鲜人民也亲如手足。“车过鸭绿江，/江东江西不一样，/不是两岸的/土地不一样肥沃秀丽，/不是两岸的/人民不一样勤劳善良。/我是说：/江东岸——/鲜血浴着弹片，/江西岸——/密密层层秧畦堆，/家家户户谷满仓。”——两江不一样的生活，诗人心底升腾起强烈的国际主义情感，这是千千万万志愿军战士共同的情感。

《枪给我吧》的灵感源自一次战斗胜利后，清理战场时看到的惨烈一幕。当时，未央刚刚得知弟弟牺牲的消息，诗人把所有的悲伤、缅怀和致敬提炼为瞬间的永恒，定格在了这一幕，让这一幕迸发出雕塑般的光芒。“松一松手，/同志，/松一松手，/把枪给我吧！……/红旗插上山顶啦，/阵地已经是我们的。/想起你和敌人搏斗的情景，/哪一个不说：/老张，你是英雄！/……”一声“英雄”，是对志愿军的礼赞，更是奋进的凯歌。诗人继续描写现场，镜头切换到周围的侵略者的军队。“看你的周围/侵略者的军队/被你最后一颗手榴弹/炸成了肉酱。”“肉酱”与“最后一颗手榴弹”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英雄的形象也顿时生动起来，仿佛激烈的战斗场景在想象的空间中重现了。“你的牙咬得这么紧，/你的眼睛还在眯着，/莫非为了你的母亲放心不下？/我要写信告诉你老人家，/请答应我做他的儿子。”镜头又回到战士身上，通过静止的画面扫描，诗人捕捉到了“咬得这么紧”的牙和“还在眯着”的眼睛，一句“请答应我做他的儿子”，迸发出诗人潜藏着的最为真挚、深沉的情感，带给读者撞击心灵的力量。

《我们的武器》赞颂了志愿军战士以简陋的武器战胜强敌的英勇精神。“‘步枪/加手榴弹，/加一把炒面，/再加一捧雪’/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的武器与敌人的坦克大炮，构成鲜明悬殊的对比。然而“敌人的坦克大炮/并没有战胜我们，/结果还不得不/坐着十轮大卡车逃跑”。我们的胜利不是武器，而是战士们的英勇不屈。诗人的情感节奏进一步加快，仿佛跟随战士一同乘胜追击，构成了对志愿军英勇奋战过程生动的刻画。

《驰过燃烧的村庄》记录了诗人在战场上奋勇救下一个全身着火的孩子的过程。孩子是战争最无辜的牺牲者，诗人依旧从“典型瞬间”进入诗歌，“那天，/我去送一道紧急的公文，/鞭着马，/驰过燃烧的村庄。/忽然，/一个被火烧着的孩子，/向我滚来。”“燃烧的村庄”是战争的罪证。“被火烧着的”孩子“既是客观事实，又是情感的升华，是战争之火烧着了无辜的孩子。”“滚”字与“鞭着马”构成了呼应，给诗人的愤怒和悲悯找到了依托，诗歌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在此得到延伸。它们激励着战士奋勇拼搏，誓死保家卫国，它们是诗人未央深沉的悲悯。

20世纪60年代以后，未央走进工厂、矿山、乡村体验生活，他在《歌唱你，祖国十月》《井冈山颂》《洞庭湖之歌》《红军当年走过我们村庄》《公社大堤讴歌》等诗歌中，把颂歌献给了为理想倒下的战士、在恶浪中苦斗的勇士和胸怀大志的改革家，奏鸣出一曲音域宽广的祖国颂。

在这些作品中，诗人大量使用长句抒情，在层层铺垫、渲染和跌宕、深化的表达中，展现时代发展的巨幅画卷，托出祖国的崇高形象。“这里从前只有爬不尽的羊肠小道，/而今宽阔的公路像玉带绕着山冈。/这里从前点油灯只许用一根灯芯，/而今电灯像满天星斗落在城乡。/这里从前断壁残垣躲避风雨，/而今只见高楼大厦瓦屋砖房。”（《井冈山颂》）通过井冈山的变化，“从前”与“而今”的层层对比，歌颂祖国建设的巨大成绩。《洞庭湖之歌》诗人在洞庭湖上看到鱼米之乡蓬勃兴起的大生产，激情蓬勃，不由得放歌一曲，“啊，洞庭湖！/你这鱼米之乡。/在你身上，/我看到了祖国辉煌的霞光……”《红军当年走过我们村庄》使用夸张的手法渲染情感，抒情色彩浓厚，“红军当年走过我们村庄，/电闪雷鸣震动四面八方，/满天乌云一时散尽，/彩霞万朵映照看朝阳。”《公社大堤讴歌》里，诗人直抒胸臆，“我爱公社的田连阡陌，/春天绿波荡漾，/秋天金光灿烂。/山坡上棉花像白云，/湖里漂着橘色的帆。”《公社大堤》记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场景，“公社大堤筑在江边，/抗击着无休无止的波浪，/一百次进攻，一千次粉碎，/日日夜夜，屹立如山。”“在那雷动的搏斗声中，/架梁盖屋，织网造船，/柳林中传来深情的低语，/山窝里飘出欢乐的笑谈。/在那雷动的搏斗声中，/我们战斗，我们流汗，/八百里洞庭八百里险滩，/八百里红旗红满天。”诗人向祖国的建设者致敬，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由衷的喜悦。

回到乡村以后，未央的创作也由书写抗美援朝转到书写乡村田地，观察乡村的变化，思考乡村的生活，开始从“田地”命运的变迁打量“人”的生活的改变。他在平凡而普通的生活中发现理想和崇高，从乡村的青春活力中感受到“祖国”心脏的跳动，写下了《湖边的生活》《获得自由爱情的情书》《寄往森林的情书》等诗篇，讴歌祖国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和获得自由爱情的幸福生活。《湖边的生活》是未央在被下放到农村的那段日子写下的，“我喜欢湖边的生活，/喜欢那刚从湖水里湖涌出来的湖上，/上面还留着枯黄的水草，/新鲜的贝壳，/松软的黑泥，/踩得出油。/向日葵高悬像报喜的铜锣，/棉花铺地如白银盖湖。/……/湖鸭在波涛上追飞，/鲤鱼跃水把你引进。”一幅幅宁静的画面、一幕幕动感十足的表演，表达了诗人对时代大潮的讴歌，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和对祖国母亲的深情依恋。

改革开放以后，未央继续书写新时代的新气象，讴歌祖国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创作了《祖国》《还是这块田，还是这块地》《秋光》《公社大堤讴歌》《书记犁田》等诗歌，用细腻的文字构筑起新时代的新气象，编织着人们的欢喜故事。“我喜欢踏着晨光和月色散步，/悄悄地，把我的祖国细看。”（《祖国》）在田埂上，诗人看到了焕发出的勃勃生机。“泥巴发出腐熟的香味，/禾苗像一片透亮的翡翠，/有经验得作田手心中有数：/亩产千斤是保守的估计。/……/还是这块田，还是这块地，/出落得容光焕发，身壮体肥。/是因为有一双满是老茧的手，/日夜把它抱在自己的怀里。”（《还是这块田，还是这块地》）“青葱的晚稻正在吐穗扬花，/紫黑的莲蓬晒满了场，/密密的油茶果要把枝条压断，/成群的鸭子追逐着虾兵蟹将。/……/我们在一角湖边徘徊，/把个体户承包的水面欣赏，/一片荒湖变成了鱼莲宝库，/人均纯利四千！喜讯传到四方。”（《秋光》）这些诗歌勾勒出农村的新人新事，表现乡村生活的巨大，并把乡村生活上升到理想的高度。

未央认为无论是创作还是人的一生，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人生就像一首长诗，他在诗歌中完成了对生命的思考和感悟。“我想要/珍惜八十年代/每一分钟，/不要让/泡不完的蘑菇/把生命消磨。”“什么我都想要啊/我要一切/美好的东西，/就是不要一样/那每个人的枷锁！”（《希望之歌》）也许经历过生死战场的未央，早就看淡了一切，在看淡一切之后却还能保持一颗感恩之心，又是极为不易。在散文《我记得那个早晨》里，未央写到：“笔是没有力量的，笔又是有力量的。我们手里既然只有笔，就要把这支笔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从抗美援朝战场到新时代的社会发展，未央讴歌祖国，礼赞英雄，记录生活，诗歌与他如影相随，他将笔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关仁山笔下的党员形象的出现与文学史塑造“新人”的传统一脉相承，并以独特的性格和命运成为变革时代的艺术象征。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尽管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但农村的变迁仍然会从总体上牵动整个社会。这一现实反映在文学中，体现在从《古船》中的隋抱朴到《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从《废都》中的庄之蝶到《蛙》中的万心，从《主角》中的忆秦娥到《经山海》中的吴小蒿等形象上。而在琳琅满目的人物谱系中，自身的成长和命运与时代精神和叙事目标关系最为紧密的，是能够正确选择政治道路和坚守信念的形象。关仁山笔下的这些共产党员形象极具代表性，一方面，他们生长在生活在农村，对乡村怀有炽热的感情；同时，他们又肩负着党组织赋予的政治使命，作者抓住了感情和责任这两条脉络排布范少山、曹双羊等人的命运。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又深陷乡村伦理和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中，人性和道德被置于权欲和物欲的考验中，一些人物终究败下阵来，丧失了共产党员的信念，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这些党员角色的道德倾向和对人生道路的肯定或批判的立场，构建起了小说主题上的价值主张，隐含着作者对乡村前途和基层政治生态的美好期待。

中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言人狗儿爷等也是较为成功的党员形象，虽然政治身份也在形象建构中发挥着作用，但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眼界和思路都较狭隘，对于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缺乏方法。从叙事上看，他们是用来自托范少山、曹双羊这类形象的功能性人物。

与上述普通党员的形象不同，在关仁山笔下，作为基层政治权力代表者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常常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们中有的只是标签化的形象，例如那些站在应当为群众服务的位子上，嘴上喊着高调的口号，但却违背党的宗旨尸位素餐者；有的则倚仗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飞扬跋扈、横行乡里，甚至鱼肉百姓。例如《白纸门》中雪莲湾的吕支书，将七奶奶辛辛苦苦要来的20万元建楼款挪去买用了小轿车；《金谷银山》中白羊峪的党支部书记费大贵干跪长期住在镇上，不参与村里的工作，反倒怪电视片上没他的镜头；《天高地厚》中的乡党委宋书记则因家贿受贿被反贪局带走。

这类人物中最典型、性格最复杂，也最发人深思的形象，当属《日头》中的权桑麻、权国金父子，以及《天高地厚》中的荣汉俊。他们既承担着党的工作职责，又深受民间文化的影响，具有包括封建特权思想在内的多重观念，他们的人生难以简单评价功过与是非。权桑麻是日头村的老支书，按照他的观念，“我是日头村的党支部书记，在日头村，我能代表党，我说话，就是党说话，你听我的，就是听党的。”他的儿子权国金接替了他的村支书位置，但父亲的行事做派已经被儿子继承下来，“人们听见明明是权国金在说话走路，可却是权桑麻现身”。权氏父子构成了典型的乡村家族式权力结构，在作品中更多地处在被批判的位置上。

相比之下，荣汉俊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争议人物。他由村支书兼任村长并担任企业厂长、董事长，直至担任县政协副主席。他是农村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也是既得利益者，但当他开始掌握权力时，则通过权钱交易等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暴露出贪欲的一面。而在对待梁双牙、鲍真等年轻一代的态度上则表现出矛盾心理，一方面给予呵护，另一方面又暗中为他们的成长和上升设置障碍，这既显现出人性的莫测，同时也反映出盘根错节的乡村伦理和利益关系，显现出农村生活的复杂性。

这类人物作为农村党组织的负责人，尽管曾经为农村现代化进程做出过贡献，但他们的很多做法与其身份不符，而且不乏违法乱纪的行为。在繁芜的乡村观念、农村现实和极大的乡村治理难度面前，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现有其现实根据和叙事逻辑上的合理性，有着高度的艺术真实性。尽管这些角色性格和道德品行皆不是单一化的，他们身上有被肯定或悲剧性的一面，但整体是被作者当作批判的对象加以塑造的。伴随故事情节的进展，这些人物要么被绳之以法，要么被群众

军》，到话剧《人民至上》、彩调剧《新刘三姐》，再到福州曲艺《血色鸡角弄》、派莱尔《有事就找咱书记》，一大批反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舞台艺术精品，记录历史伟业，激发革命斗志，鼓舞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从“有没有、缺不缺”到“好不好、精不精”，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发生了深刻转变。提升文化内涵、为精神“补钙”的文化旅游休闲活动备受青睐。2018年4月8日，新组建的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诗和远方终于在一起了！”这一改革实招戳中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新时期期待。

数据显示，国内游人数从2011年的26.41亿人次增长到2019年的60.06亿人次。与此同时，红色旅游热度逐年攀升，从2004年到2019年，每年参与红色旅游的人次从1.4亿增长到14.1亿。

2021年5月31日，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宣传部等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沿着中华大地的“红色版图”，人们追寻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

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创新活力

古老的紫禁城外，身着雅致汉服的年轻人排起长队，构成一道颇具“穿越感”的独特风景。在这些“90后”“00后”眼中，这座600多岁的皇家宫殿是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的“网红”。

从“紫禁城里过大年”到赏灯“上元之夜”，再到“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大展，故宫正以新创意创造着新价值。

“保护文化遗产，真正的目的是传承，让文化遗产成为促进社会进步、增强文化自信的基石。”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说。

从1987年长城、故宫等成为我国首批入选的世界遗产，到如今以55项世界遗产位居世界前列；从2002年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

（上接第1版《从文学走向更广阔的原野》）当天下午，“无界·收获APP双盲命题写作大赛”正式启动。弋舟、刘大先、黄平、项谦、郭冰茹、徐刚、走走、孟小书、马小淘、石一帆、李壮、金春平、孙睿、淡豹、蔡冉冉等青年作家、评论家以“文学无界 心如原野”为主题做了演讲。李敬泽作了总结。王尧主持。大家认为，所谓“小说革命”是从小说的发展规律和自身变革的内在需求提出的，充实、丰富和创造小说革命的内部条件是小说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时代和文明已经远远走在作家前面、走在文学前面，最重要的是，人本身已经走在了文学前面。文体固然重要，但比起文体，更重要的是文学性。在文体或者文类上做种种跨越的花样，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来拓展和发现新的文学性，需要作家、评

“新人”形象的表达和变迁

——论关仁山小说中的党员形象 口 桡 桡

回顾当代文学史，新文学运动以来，乡土题材曾长期是小说创作的主流，一代又一代作家为读者贡献了一大批经典作品和农民艺术形象。作为曾经掀起“现实主义冲击波”的重要作家之一，关仁山熟悉农村，对乡村和农民怀有深厚感情，他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在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中得到呈现。由于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因此农业和农村生活深受政策影响。在此基础上，关仁山在《日头》《天高地厚》《白纸门》《麦河》和《金谷银山》等长篇小说中，以土地和农村产业政策调整过程中的传统乡村生活，以及党领导下的乡村治理方式变迁等为背景，观照由此引起的农民精神状态与心理情绪的变化，以一批具有党员身份的典型形象扣住了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脉搏。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做时代的弄潮儿，又肯奉献自我，带领群众发家致富，促进乡村发展的党员形象，是关仁山着力塑造的人物，以《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和《麦河》中的曹双羊为代表。这些党员形象有的一身正气，心系百姓；有的虽有复杂的人生经历和道德品性，但总体上贯彻了党的农村政策，并敢于与传统乡村观念、宗族势力和利益集团等做斗争，为改变农村面貌、改善农民生活做出了贡献。

《金谷银山》中的范少山是一个《创业史》中梁生宝式的人物，小说以他带领白羊峪发展绿色农业帮助百姓脱贫致富的全过程为主线，用文学手法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发展理念。范少山5年前离开祖居的白羊峪到北京卖菜，回乡时在大雪纷飞中经历了孤独贫困的邻居老德安自杀事件。面对“一个人活得没指望，一个村活得没希望”的乡村困境，他告别恋人、放下北京的生意，执意回到故乡去做拯救乡村的“超人”。从此，他的命运和乡亲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看准祖辈种植谷子的资源，利用土地流转政策扩大种植面积，在专家指导下发展“金谷”产业；又修通了出山的公路，并推广光伏发电，不仅保住了已经被列入异地搬迁的白羊峪，还使村民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作者将范少山对传统道义和文化的传承、对党的信念的坚守和对时代精神的追求融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理想化的乡村领袖人，无疑也是新时代所期冀的“新人”形象。

比《金谷银山》更早创作的《麦河》也是将故事放置在以土地流转为基础的新农村建设上，但与范少山淳朴的理想主义相比，《麦河》中从“农业人格”转型为“商业人格”的曹双羊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形象。曹双羊通过开办方便面厂引导村民流转土地，帮助故乡鸪鹑村走上了富裕之路。曹双羊、范少山两个人物的人生经历和性格变化，折射出中国乡村发展方式的变革，以及传统农耕文化与乡村道德观念的流变。

此外，《金谷银山》中的村民小组长余来锁、《麦河》

（上接第1版《坚定文化自信 精彩精神生活》）

来看文化产业“十三五”以来的成绩单：2015年至2019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2.7万亿元增长到超过4.4万亿元，年均增速接近13%，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3.95%上升到4.5%。

让我们将时间的纵深拉长：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成为新中国文化市场兴起标志；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厘清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双轮驱动的文化体制改革拉开序幕；进入新时代，文化产业稳步向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迈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足迹描绘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上升曲线。

风貌焕然，标注“文化小康”的丰硕成果——

在陕西安康，新风建设引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展，几年来摆酒席减少三分之二，“人情份子”下降七成；在福建福安，旧民居变身新时代文明实践“新课堂”；在甘肃金昌，“好婆媳、好邻里点赞”“分餐夹”等文明实践推动完善村规民约、倡导文明风尚……

赋能美好生活，弘扬时代新风。近年来，结合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各地加快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国累计建成村级文化中心57万多个。甘肃“乡村大舞台”、湖南攸县“门前小小”（小广场、小书屋、小讲堂）等创新实践接地气、旺人气、正风气，广受群众好评。

随着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力也大幅提升，提供“菜单式”“预约式”服务成为常态。据统计，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博物馆推出2000余个线上展览，吸引超50亿人次浏览，让“云生活”演绎出别样精彩。

提振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掀起年轻人追剧热潮，陈独秀的扮演者于和伟喜提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对口扶贫题材电视剧《山海情》从“出圈”迈向“出海”，在国际市场获得肯定，先睹为快的海外观众纷纷点赞……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放眼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明之花处处绽放。用文化提振精神力量，传承红色基因，形塑亿万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每年出版图书1.5万种，如今每年出版图书约50万种。特别是近年来，更是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时代精神的‘中国好书’。”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说，“书荒”到“书海”的跨越，见证了国家发展、时代进步，也进一步满足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围绕建党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强国、抗击疫情等主题，全国国有文艺院团复排、创排了数千部优秀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作品。从民族歌剧《白毛女》、芭蕾舞剧《红色娘子

（上接第1版《从文学走向更广阔的原野》）当天下午，“无界·收获APP双盲命题写作大赛”正式启动。弋舟、刘大先、黄平、项谦、郭冰茹、徐刚、走走、孟小书、马小淘、石一帆、李壮、金春平、孙睿、淡豹、蔡冉冉等青年作家、评论家以“文学无界 心如原野”为主题做了演讲。李敬泽作了总结。王尧主持。大家认为，所谓“小说革命”是从小说的发展规律和自身变革的内在需求提出的，充实、丰富和创造小说革命的内部条件是小说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时代和文明已经远远走在作家前面、走在文学前面，最重要的是，人本身已经走在了文学前面。文体固然重要，但比起文体，更重要的是文学性。在文体或者文类上做种种跨越的花样，并不能解决多少问题。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来拓展和发现新的文学性，需要作家、评